

政策话语建构政策认同： 门诊共济改革中的利益、价值与自我观念^{*}

邱玉慧^{**}

【摘要】政策话语建构政策认同有赖于主体的利益诉求、价值匹配及其差异化定位。本文基于门诊共济改革的新浪微博数据,采用 OLS、Logit 模型和倾向值匹配方法,分析了在政策话语调整前后主体认同的显著差异及话语类型间的复杂性。研究运用扎根理论方法,识别出价值导向与具象认知两种自我阐释逻辑、五种认同路径及“话语-情境-自我”循环互构过程,并发现,价值自我对具象自我呈有条件统合,取决于价值自我的明晰性、具象自我的情境敏感性及二者方向的一致性,进而呈现出差异化认同路径;自我观念既源于政策话语及实践建构,也具有情境建构性。本文为分析利益与价值认同的复杂机理提供了新的场景和更细致的经验证据。

【关键词】门诊共济;政策话语;政策认同;自我观念;扎根理论

一、问题的提出

公共政策研究日益关注信息框架、叙事、辩论等对话沟通工具对增进政策认同的效果。这既取决于政策话语的建构方式,也受制于政策适用主体(以下简称“主体”)的主观认知和差异化解读,即主体如何接收、阐释政策信息。已有研究通过实

* 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重大民生改革的政策话语建构及其网络舆情引导效果评估研究”(项目批准号:23YJAZH112)的资助。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及编审专家提出的建设性意见;感谢天津科技大学姚伟教授及相关会议专家的评议。

** 邱玉慧,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学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政治安全与治理人才培养基地成员,helenling99@163.com。

引文格式:邱玉慧. 2025. 政策话语建构政策认同:门诊共济改革中的利益、价值与自我观念[J]. 公共管理评论,7(3):91-115.

Cite this article: Qiu Y H. 2025. Policy discourse and policy identification: Interests, values, and self-concepts in China's outpatient mutual-aid health insurance reform[J]. *China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7(3): 91-115. (in Chinese)

验及调查等方法在政策话语的“说”和“听”两方面均积累了非常有价值的成果,而对真实政策场景中主体的差异化管理及认同生成过程研究仍有待深化。

政策认同的关键在于主体与政策信息的利益匹配与价值匹配(桑玉成, 2006; 李燕, 2020),但对于何者占主导地位尚存争议。政策认同指主体对政策目标、过程、适用性、推行效果及未来预期的总体评价(郑建君, 2015),强调主体对政策运行体系的深层情感和归属感(陈潭, 2006; 周忠良等, 2023)。有研究认为,一方面,政策认同取决于利益损益的预期(桑玉成, 2006);另一方面,人具有价值观念性,其政治信仰、价值观念等起实质作用(景怀斌, 2021)。同时,不同主体对自身利益与价值观念的理解和定位也存在差异,相关研究还揭示了自我角色认知的深层影响(彭国胜, 2012)。那么,主体的利益、价值与自我角色定位之间存在怎样的差异化组合,政策话语如何有针对性地言说才能有效激发主体认同?

对于上述问题,医疗保险门诊共济改革具有较好的研究价值,它为研究政策话语“说-听”互动及主体间认同差异提供了真实场景。首先,医保等社会保险领域改革具备个体与公共、利益与价值双重张力的突出特征,常导致政策话语认知偏差甚至断裂。门诊共济改革作为典型事项,甚至被称为一场“社会压力实验”(郑秉文, 2023)。其次,社会保险的政策适用主体本身具有高异质性,且利益诉求和价值感知均呈高复杂性,因此是研究差异化认同路径的理想政策场域。再次,此次改革中,随着公众负面反馈的压力增大,政策话语的宣传策略经历了从强调“利益”到突出“价值”的显著转变。这为改革认同研究提供了较完整的过程要素。

中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含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医保)的门诊共济改革全面推广于 2019 年。改革前,医保资金账户由统筹账户和个人(家庭)账户组成^①。统筹账户主要用于住院费用报销,体现互助共济的主体功能;个人账户用于个人自付医疗支出,体现个人责任,是早期为鼓励个人参保而设立的过渡性措施。然而,实践表明,这一设计导致了门诊保障不足和个账资金使用低效问题(王超群和李珍, 2019),变相削弱了医保互助共济功能^②。改革内容包括:城乡居民医保取消个账;职工医保采用“权益置换”方式(杨燕绥等, 2020),将原来由用人单位缴纳计入个账的资金改计入统筹账户,用于门诊报销,并向老年和慢特病群体倾斜。然而,改革中不仅出现了广泛的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认知冲突,还引发了有关医保制度应遵循“多缴多得”还是“互助共济”的价值争论。相应地,政府的政策话语策略也发生了转变,即由初期侧重“个账”利益调整,转变为后期强调“互助共济”价值目标及门诊共济利益实现机制的宣传。

传统社保认同研究多基于量化方法,聚焦政策常态下的认同影响因素分析,但

① 职工医保由单位和个人共同缴费,单位缴费一部分进入统筹账户、一部分划转个人账户,比例因地而异;个人缴费进入个人账户,比例一般为本人月缴费工资额的 2%。居民医保由个人缴费和政府补贴构成,资金主要划入统筹账户;部分地区曾设立个人或家庭账户,但多数已于 2019 年以前取消。

② 截至 2019 年年末,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累计结存 8276.50 亿元。参见国家医保局. 2019. 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北京:国家医保局。

仍存在一定局限。一是侧重于支持度、满意度等表征测量,较少揭示认同的深层情感根源。而政策认同尤其关注利益匹配和价值匹配过程中的理解、互动、信任、心理归属和情感依附(杨正联,2010;陈潭,2006)。二是侧重政策常态下的总体测量,较少呈现动态政策场景下的认同生成过程、差异化路径及心理机制。对此,质性研究方法具有独特优势,如扎根理论、个案分析(李蓉蓉等,2023;袁方成和李会会,2020)可以形成补充,但其在社保改革认同的动态研究中的应用尚有待拓展。

本文采用量化分析与扎根理论相结合的研究策略。以2019年至2022年门诊共济改革期间的新浪微博数据作为分析素材,重点回答以下核心问题:此次改革中政策话语认知断裂是如何发生的?主体的利益与价值认同存在哪些差异化路径?如何优化政策话语以增进政策认同?研究采用基准回归和倾向值匹配分析,检验改革过程中政策话语调整下认同倾向的差异及变化;运用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探究主体认同的心理过程和差异化路径。扎根理论是一种从经验分析中生成理论并据此解释现象的质性研究方法。分析资料多采用研究对象的语言陈述或文本,适用于人的心理机制及过程研究。

二、门诊共济改革争论与理论回顾

(一) 改革争论与医保政策认同影响因素

基本医疗保险是由政府主导建立的、旨在为参保者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及医疗支出补偿的社会保险制度。针对长期以来的个人账户资金使用低效、门诊保障不足等制度缺陷,我国自21世纪初即开展门诊报销试点改革,并于2019年4月起正式推进全国改革。201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也已在制度层面取消了个人账户的法定地位。

改革争论中,利益认知的偏差与冲突最为凸显,集中体现在职工个人账户缩减及“权益置换”后门诊待遇提升可能性的差异化评估上。这一矛盾具有双重特征:一方面,个人账户缩减是确定的;而另一方面,不同参保主体实际享受的门诊报销待遇可能因自身状况、需求、具体政策而异。因此,利益认同的关键在于:主体能否接受“确定”的利益减少和“不确定”的利益提升,以及门诊待遇的“不确定享受者”向“相对确定享受者”的利益让渡。

与上述利益认知断裂相伴随的,是价值认知的偏差与冲突,集中体现于对医保制度的双重属性和改革目标的理解分歧上:医保本质是“保险”还是“再分配”?应遵循“多缴多得”还是“互助共济”^①原则?所谓“保险”属性,指以缴费机制和大数法则为基础的健康者与患病者之间的“风险共济”,在缴费与待遇的精算关系上更强调

^① 所谓“共济”,既指一种价值理念,也指一种利益保障机制,不同语境下含义不同。一是作为制度理念和改革价值目标的“互助共济”,包括保险的风险共济和再分配的社会共济。二是用作改革正式名称的“门诊共济”,指“互助共济”的利益保障机制。三是作为个人账户资金使用规则的“家庭共济”,指“资金共用”。微博场域中对“互助共济”和“门诊共济”的宣传与这一概念存在一定混淆。

“多缴多得”。但当把缴费资金划入个人账户且仅用于个人支出时,就进一步强化了主体“多缴多得”的认知,使其忽略了风险共济功能。与此同时,基本医保又不仅是“保险”,还具有“社会共济”属性,具有通过高收入群体向低收入群体的再分配来实现反贫困的功能。对此,政策文本表述为“健全互助共济、责任共担的全民医保制度”,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同时待遇支付向退休及慢特病群体倾斜。支持者认为,医保功能就是扶弱济贫的再分配,虽然个账资金减少了,但能提升整体保障效能。而反对者则主张医保应遵循多缴多得原则,强调个账资金属职工个人福利和个人财产,不应进行“再分配”。

相关研究也从多维度探讨了医保政策认同的影响因素。一是主体的利益判断与价值判断维度。有研究认为,医疗保险满意度或福利认同主要取决于主体的经济理性及利益目标的即期性(于长永,2012)。具体影响因素包括医疗服务可及性、医保筹资及报销比例、医疗费用自付比例等(仇雨临等,2009)。另有研究指出,医保改革作为公共政策过程,本质上是主体的价值判断与选择过程,也是公共价值建构过程(包国宪和刘宁,2019)。二是影响利益和价值判断的主体性因素。(1)主体客观因素,包括主体健康状况(如是否患有特殊疾病或慢性病)及历史就医经验(既往正面或负面就医、住院、报销经历等)(李佳,2018)。(2)主体自我角色观念,即主体对自身社会角色及权利、义务的感知(彭国胜,2012)。研究表明,当道德义务感成为主导因素时,个体会产生亲社会行为的内在激励(Bowles,2016),进而激发群体性动机,关心他人福利(Schwartz,1977)。(3)主体认知方式。行为经济学观点认为,门诊共济改革中,主体已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不言自明的“心理账户”,因而对个账资金缩减产生抵触心理(郑秉文,2023)。

(二) 政策认同及其话语建构:有关内在动机的理论争论

1. 利益与价值两种动机的关系问题

政策认同有赖于主体的利益匹配和价值匹配。一方面,利益源自需要,其通过理性认知来塑造情感认同(袁方成和李会会,2020)。利益认同还意味着主体与决策者的相互理解、互动、信任(杨正联,2010),并且利益预期本身也能产生理性信任(Bigley and Pearce,1998)。另一方面,由于单纯经济理性解释的局限性,研究者还寻求价值、规范等动机解释。所谓“价值”,此处指个人或群体持有的某种价值观,或作为一种标准提供规范选择的依据或正当性,是个人动机和公共政策支持的重要来源之一(Dunn,2018)。有研究认为,短期利益认同属于浅层认同,而价值观、情感等观念因素则会影响深层认同:当政策价值与个体价值观发生冲突时,可能引发政策抗拒这一极端认同障碍;而当二者相吻合时,则会产生“稳固、可靠的社会心理基础”(王国红,2007)。

有关利益与价值二者关系,学界存在两派观点,这里称为“分立说”与“统合说”。“分立说”主张利益与价值是两种不同的决策系统,利益认同是对客观物质利益的理

性计算,而道德、价值观、社会规范等属于非理性系统(Ariely, 2008),与理性计算有着不同的行为选择逻辑(Boudon, 2003)。当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不一致时,价值系统和利益系统可能呈现不同倾向(Funk, 2000)。这种张力表现为人们对总体社会福利政策和涉及切身利益的具体福利措施的态度往往存在差异(Kangas, 1997)。“统合说”则认为,价值等认知本身就是理性能力的一部分,利益是主体基于物质事实的主观想法和回应(Schmidt, 2010)。价值观能够重塑个人的风险和收益感知(De Groot et al., 2013)或激发主体的责任感和义务感(Steg et al., 2005),从而改变其政策倾向。这一观点与Lasswell(1970)提出的“价值即偏好排序”论断形成理论呼应。

2. 利益与价值动机的主体间差异:一种自我观念的解释

“自我”能够被用来解释主体动机,是因为它被视为一个观念阐释系统或心理符号系统;自我知觉、描述或自我印象被称为“自我概念”(Hogg and Abrams, 1998)或“自我的观念”(威利, 2011)。该系统通过对自身及相关事件的解释来建构心理世界;它既包括物质的自我(如身体、财产),也包含社会的自我(他人评价及社会价值规范)(俞国良等, 2016)。如Cooley(1902)提出了“经验自我”(empirical self)概念,指某种“具象的自我感受”(concrete self-feeling),包括身体感觉、社会生活感受、习惯、身份关系等。其中,身份关系是内在自我的临时表意和具象化呈现,称为“具象自我”(陈文斌, 2016)。而Taylor(1989)则认为,自我身份认同不仅指某种客观身份分类,还意味着主体认可某种道德准则和规范性框架,提供不同情况下的价值判断标准,包括什么是好的、有价值的、应该做的,以及应当支持或反对的立场选择。因而,自我观念既具情境敏感性(Hogg and Abrams, 1998),又有规范性、理念性特征(Taylor, 1989)。

有关自我观念的争论聚焦于其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情境性或稳定性。一方面,人在不同时空、不同语言符号、不同互动情境等因素刺激下,会凸显不同的自我,呈现出“流动性”特征;另一方面,自我身份认知又源于客观物质基础,具备“硬性”或“稳定性”(Brubaker and Cooper, 2000; Baron and Branscombe, 2012)。

3. 政策话语的认同建构:利益与价值如何言说的问题

政策话语作为政策信息的语言和意义集合,是主体利益、价值判断的主要信息来源。完整的政策言说应至少包含四个解释维度:政府做什么、为什么做、意义是什么、怎么做。对此,杨正联(2010)以利益认同为核心提出了后果(利益前景)、实是(客观利益状况)、评价(价值标准)及行动(行为方式)分析框架。Fairclough & Fairclough(2012)提出了政治话语分析的五要素框架:诉求、环境、目标、价值和手段。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信息要素对政策意义的阐释作用存在显著差异。相较于单纯利益言说,价值观念解读更易获得合法性认同,因为利益逻辑仅能提供行动理由,而规范性政策观念能够提供“好与坏”“应当或不当”的判断标准(Blyth, 2002)。郭跃等(2023)还发现,在特定的信息解释水平下,代表公共利益的抽象接受度同时受道德和经济理性的双重影响,而代表切身利益的具象接受度只受经济理性影响。相关研究还提出了框架效应理论。对某一方面信息的选择性强调会引导公众的关

注焦点(Druckman, 2001)。相同信息采用不同措辞方式也会呈现不同效果,如获得感框架比损失框架更有助于政策营销(鹿斌, 2023)。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一) 研究设计

本文分两阶段展开分析。首先,描述医保门诊共济改革中政策话语言说的演进过程,运用基准回归和倾向值匹配法,检验不同阶段话语策略下主体认同倾向的差异和变化。其次,采用扎根理论编码方式,剖析主体认同的心理过程、差异化路径及作用机制。扎根理论方法包括五种主要分析模式。本研究选取其中的温和建构主义模式。它区别于早期元模式与经典模式强调的自然浮现和归纳逻辑,而是要求综合运用归纳、演绎与推断(Kennedy & Thornberg, 2018),并在理论生成中与既有理论进行循环对话修正(Atkinson et al., 2003)。

(二) 数据来源

本文选用的政策文本资料为 2019 年 4 月至 2021 年 4 月中央政府部门发布的 5 份政策文件。所收集用于政策话语传播及认同表达的分析资料是 2019 年 5 月至 2022 年 4 月(上述文件发布一年后)的新浪微博数据,检索词设定为:“医保/医疗保险”加“门诊共济/门诊报销”(改革名称及目标)或“个人账户”(改革措施)。共获得相关博文 3182 篇(机构 1694 篇、个人 1488 篇)和评论 17523 条。鉴于本文重点关注“共济”解读的有效性,对 3182 篇博文中引用的政策文本及其解读内容进行话语分组,即“个账话语”和“共济话语”两组。分类方法为:除文件名称外,依据内容是否包含“互助共济”“门诊共济”或“门诊报销”,不含这些表述的归为个账话语,包含的归为共济话语^①;没有解读内容的,按话题标签或文章标题分组。5 份政策文本及分类后博文数据情况见表 1。两类话语博文发布数量随时间分布的情况见图 1。

为分析认同倾向,研究对 1488 篇个人博文和 17523 条评论数据进一步清洗、赋值。剔除重复发布、表意不明、用户信息不完整等数据后,最终保留博文 949 篇、评论 9795 条。用户信息的样本描述见表 2。其中,认证类型和性别根据用户原始信息赋值;门诊报销地区,根据 2019 年 6 月前用户 IP 所在地域的门诊报销政策^②,分为“已实施”与“未实施”;行业类型参照邢千里等(2015)的研究,根据用户标签及简介提取,分为“医药或保险相关”与“不相关”;注册年限根据注册时间计算得出;活跃度则采用关注数、粉丝数、发文数量的标准化均值来衡量。

① 分组过程中同时尝试了三分类方法:只含个账、同时含个账和共济、只含共济。但只含共济的样本比较少,且三分类也会使讨论更加复杂和分散,因此采用二分类。家庭共济解读归入个账话语。

② 根据各省职工医保政策整理获得,截至 2019 年 6 月,部分地区已开展慢特病、社区首诊、门急诊、家庭病床等形式的门诊统筹;北京、河北、天津、浙江、福建、广东等地还开展了普通门诊统筹试点。

表 1 政策文本与各阶段博文数量及话语类型

话语类型	居民医保 反馈阶段[1]~[3]	职工医保 征求意见阶段[4]	职工医保 正式推行阶段[5]	总计	机构	个人
	2019.04.26— 2020.08.25	2020.08.26— 2021.04.21	2021.04.22— 2022.04.27			
个账	129	679	836	1644	729	915
共济	207	539	792	1538	965	573

- 政策文本
- [1] 2019.04.26《国家医疗保障局财政部〈关于做好2019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的通知〉》(医保发〔2019〕30号);
- [2] 2019.06.02《国家医疗保障局〈关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门诊保障政策的解读〉》;
- [3] 2019.06.0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9年重点工作任务的通知〉》(国办发〔2019〕28号);
- [4] 2020.08.26《国家医疗保障局〈关于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
- [5] 2021.04.2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1〕14号)

注:[1]~[5]为5份政策文件。阶段划分以文件发布日期为界。2022年4月27日为数据采集截止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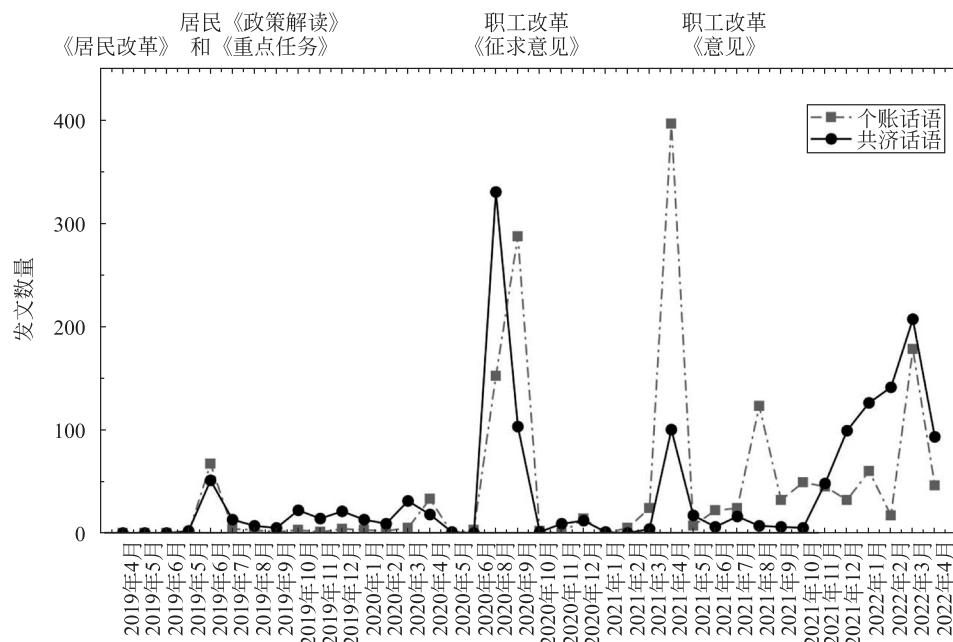


图 1 个账与共济话语发文数量时间分布

表 2 样本描述

用户信息赋值	博文样本 (N=949)			评论样本 (N=9795)		
	均值	标准差	取值范围	均值	标准差	取值范围
认证类型(认证=2)	1.278	0.448	1/2	1.078	0.269	1/2
性别(男=2)	1.418	0.494	1/2	1.413	0.492	1/2
门诊报销地区(实施=2)	1.458	0.499	1/2	1.409	0.492	1/2
行业相关(相关=2)	1.085	0.28	1/2	1.036	0.186	1/2
注册年限	8.686	2.985	0.6~12.9	10.420	3.036	2.159~14.810
活跃度	0.00249	0.738	-0.360~8.623	-0.00478	0.688	-0.314~17.91

四、门诊共济改革的政策话语演进与认同变化

从门诊共济改革的进程看,政策话语及其在微博场域的传播,既存在互动演进,又包括话题差异。综合杨正联(2010)、Fairclough and Fairclough (2012)的话语要素,分别对 5 份政策文本及微博高热度话题、典型博文的标题进行编码,分为实是、价值、目标、行动及后果,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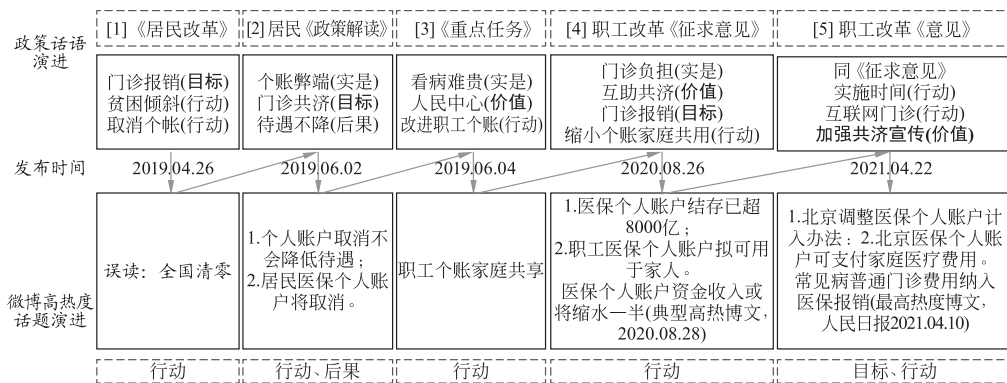


图 2 政策话语与微博高热度话题演进

一方面,随着主体意见反馈,政策言说重点逐步由“个账”(行动)转向“共济”(价值/目标)。改革初期,因文本[1]中居民医保“取消个账”的表述被普遍误读为个账余额“全国清零”,文本[2]特别解释了个账取消后待遇不下降,但未重点宣传“互助/门诊共济”。文本[3]仍处于居民改革反馈阶段。文本[4]发布后,主体对个账缩减的负面反馈较强烈。随后文本[5]着重强调:充分宣传“门诊共济保障机制对减轻参保人员医疗费用负担、促进制度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重要作用,大力宣传医疗保险共建共享、互助共济的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个账与共济话语的热度存在明显偏差。如图 2 所示,个账话语在各阶段持续维持高热度;文本[4]阶段还出现了严重解读偏差,部分高热度博文着重强调

个账利益损失。

从图1也可看出,个账话语发文量在文本[4]、[5]发布前后均迅速增加且明显占优;后期随着宣传重点改变及各地政策出台,共济话语逐渐增多。

为呈现微博场域不同话语下的认同差异及变化,本研究分别对949篇个人博文中的评价语句和9795条评论进行认同倾向打分。博文评价语句采用人工打分,参照李克特量表赋值为1至5分。随机抽样10%的样本进行编码员信度检验,结果显示百分比和斯皮尔曼秩相关系数的一致性分别为0.81和0.86。以此为基础划分训练集和测试集(3分及以上赋1,其他赋0),调用百度情感倾向分析平台训练打分模型,准确率为92.4%,进而利用该模型对评论打分(赋值0/1)。基于百分比一致性的人机信度为:便利抽样1000条的信度值为83.7%;分5次随机抽取200条,信度值最低为76.6%、最高为86.5%,平均值为80.42%。

如图3所示,微博场域的总体认同倾向偏低,但在文本[5]加强共济宣传后渐趋平稳。博文样本在5分制下的均值为2.5,评论样本在0/1赋值下的均值为0.29。在文本[4]《征求意见》临近时点,博文和评论的认同倾向均出现了最低值。但在文本[5]加强共济宣传临近时点,博文的认同倾向出现了最高点,而评论则呈现相反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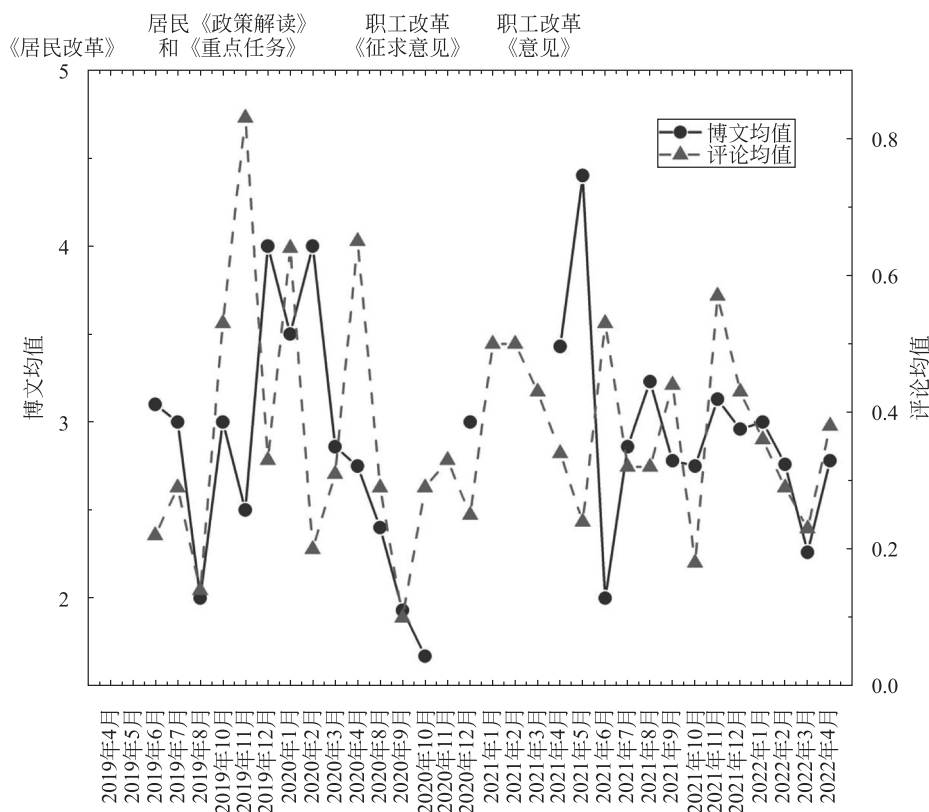


图3 博文及评论认同倾向的时间变化

根据已有研究,强调利益预期及改革收益的解读应有助于增强利益认同(杨正联, 2010; 鹿斌, 2023); 而强调政策价值及目标的解读更有利于增进价值认同(Druckman, 2001; Blyth, 2002)。改革中,随着政策话语重点转向互助共济价值与门诊共济目标解读,各地政策措施及细则也逐渐增多,理论上既有助于强化改革价值认同和具象利益获得感,也能弱化个账利益剥夺感。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 加强共济话语宣传有助于提升主体认同倾向。

H1: 加强共济话语宣传后,相比加强宣传前,主体认同倾向有所提升。

H2: 接收了共济话语解读的主体,相比仅接收了个账话语解读的主体,拥有更高的认同倾向。

按照上述假设,进一步对数据进行操作。(1)时间分组作为 H1 操作变量。对加强共济宣传前赋值 0,之后赋值 1,时间节点为文本[5]的发布时间 2021 年 4 月 22 日。(2)以话语分组作为 H2 的操作变量。采用表 1 中的话语分类,将个账赋值 1,共济赋值 2。同时将每篇博文的话语分组赋值同步赋予其对应的评论。

表 3 和表 4 呈现了 OLS 和 Logit 两种方法下,基于时间和话语双重分组的回归结果。为行文简洁,省略了模型公式及控制变量结果。分析发现,H1 假设得到验证。在博文和评论的三个全样本模型(1)、(4)、(9)下,加强共济宣传后,总体认同倾向均值都有显著提升;且这一结果在所有话语分组模型中均显著。其中,Logit 模型(5)、(6)和(10)、(11)下可见,加强共济宣传后,相对于共济话语,个账话语下的主体认同倾向提升更明显,结果更稳健。但 H2 假设结论尚无法确定。在三个全样本模型和 Logit 时间分组模型(7)、(8)和(12)、(13)下,两话语间并未呈现稳健的系统性认同差异:博文样本中共济话语组的主体认同倾向高于个账话语组,而评论样本的结果则完全相反,且不够稳健。

表 3 博文样本回归结果

变量	OLS 模型			Logit 模型				
	(1)	(2)	(3)	(4)	(5)	(6)	(7)	(8)
	全样本 N=949	个账 N=660	共济 N=289	全样本 N=949	个账 N=660	共济 N=289	宣传前 N=607	宣传后 N=342
时间组 (宣传后)	0.35*** (-0.07)	0.34*** (-0.08)	0.38** (-0.14)	0.76*** (0.15)	0.81*** (0.19)	0.67* (0.27)		
话语组 (共济)	0.49*** (-0.07)			0.90*** (0.15)			0.99*** (0.20)	0.76** (0.2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2.11*** (-0.12)	2.28*** (-0.13)	2.32*** (-0.23)	-1.38*** (0.28)	-1.08** (0.34)	-0.86 (0.45)	-1.41*** (0.36)	-0.72 (0.45)
r2_a/r2_p	0.18	0.17	0.08	0.12	0.09	0.09	0.15	0.06

注:***、**、* 分别表示在 0.001、0.01、0.05 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因数据本身的非追踪性及主体阅读行为可能存在的自选择问题,研究采用倾向值匹配法检验上述 H1 结论的稳健性。将话语分组和其他控制变量作为混淆因素进行样本匹配,将时间分组视为近似的随机处理变量,其中加强共济宣传后的样本为处理组,之前的为控制组。表 5 显示,在三种匹配方法下,处理组、控制组及全样本的平均因果处理效应均显著。

表 4 评论样本回归结果

变量	Logit 模型				
	(9)	(10)	(11)	(12)	(13)
	全样本 <i>N</i> = 9795	个账 <i>N</i> = 6683	共济 <i>N</i> = 3112	宣传前 <i>N</i> = 6137	宣传后 <i>N</i> = 3658
时间组(宣传后)	0.31 *** (0.05)	0.36 *** (0.06)	0.20 * (0.09)		
话语组(共济)	-0.14 ** (0.05)			-0.07 (0.06)	-0.26 ** (0.0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30 *** (0.09)	-0.34 ** (0.10)	-0.34 * (0.16)	-0.48 *** (0.12)	0.29 * (0.14)
<i>r</i> ² _{adj}	0.02	0.02	0.03	0.02	0.02

注:***、**、* 分别表示在 0.001、0.01、0.05 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 5 倾向值匹配结果

处理变量	匹配方法	样本	处理组	控制组	平均处理效应			
					ATT	ATU	ATE	
时间组	半径匹配	博文	935	342	593	0.366 ^{***} (0.073)	0.367 ^{***} (0.070)	0.367 ^{***} (0.066)
		评论	9784	3652	6132	0.062 ^{***} (0.009)	0.063 ^{***} (0.009)	0.062 ^{***} (0.009)
	核匹配	博文	941	342	599	0.350 ^{***} (0.073)	0.359 ^{***} (0.070)	0.356 ^{***} (0.066)
		评论	9785	3653	6132	0.063 ^{***} (0.009)	0.059 ^{***} (0.009)	0.060 ^{***} (0.009)
	马氏距离匹配	博文	949	342	607	0.388 ^{***} (0.077)	0.327 ^{***} (0.078)	0.349 ^{***} (0.070)
		评论	9795	3658	6137	0.071 ^{***} (0.009)	0.063 ^{***} (0.009)	0.066 ^{***} (0.009)

注:***、**、* 分别表示在 0.001、0.01、0.05 水平下显著。倾向性得分计算使用 Logit 模型。各变量匹配后标准偏差基本小于 3%,极少数情况略高于 6%。ATT、ATU、ATE 分别为处理组、控制组、全样本的平均处理效应,括号内为标准误。bootstrap 抽样博文 500 次、评论 100 次。样本匹配在共同取值范围。半径匹配卡尺为 0.01。核匹配采用默认核函数(二次核)及带宽(0.06)。

上述结果表明,加强共济宣传后,总体认同倾向显著提升,尤其对此前个账话语解读下的主体认同倾向提升更明显、结果更稳健;但个账和共济话语间的主体认同差异并不稳健,共济话语下的认同倾向并未一致性地高于个账话语。这可能意味着,即使在总体舆论环境改善的情况下,主体认同的复杂性也依然存在。但这一结论也可能受限于微博数据的偶然性。此外,由于数据具备非结构化特征,利益与价值两种动机的不同作用也较难分离。以下将采用扎根理论进一步分析政策话语言说下主体认同的内部心理差异。

五、政策话语的认同路径分析

(一) 编码过程

以下采用三阶段扎根理论编码,进一步分析门诊共济改革的主体认同差异化路径及过程。研究将 949 篇个人博文作为编码对象,评论资料用于理论饱和度检验,结果未发现新的类属,但补充了部分概念下的倾向表达。编码过程由研究者与编码员共同讨论完成。开放编码形成 33 个初始概念,研究遵循温和建构主义分析模式,将初始概念与既有理论概念反复对照后归入 13 个类属(见表 6)。括号中为对应资料的关键词示例,“/”用于区分不同倾向的资料。

表 6 初始概念与类属

类属	初始概念
问题认知	个账沉淀(结余浪费/结余不多); 门诊负担(老年人负担重);统筹压力(医保不容易/医保没钱了)
价值评价	门诊置换(用途合理/充公)、个账共用(于情于理/无意义)
利益评价	个账利益(范围广了/不够用)、门诊利益(提高/更贵)
措施评价	个账管理(规范性、实用性);门诊报销(效率性、便捷性);措施可行性(时间、细则、贯彻、针对性)
认同倾向	认同倾向(支持/反对/中立)
制度信任	效能感(征询、参与)、制度契约信心感(旁氏骗局)、制度信赖感(制度优越/不如商业医保)
政治信任	国家体制(综合国力、社会主义优越性)、政府决策(仁政/说改就改) 公平感(区域公平、代际公平、制度公平) 体验感(报销经历、看病难贵、缺少医保)
具象情境	压力感(医疗支出压力、生活压力) 稳定感(养老、医保、离婚等政策变动频繁) 风险感(疫情、经济下行、财政紧张、老龄化、养老金缺口、独生子女)

续表

类属	初始概念
价值情境	制度理念(互助共济、“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分配原则(多劳多得、“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私有化与大锅饭)
具象型 身份关系	代际关系(年轻人与老年人、在职者与退休者、80—90后与50—60后)、收入及职业群体间关系(高收入与低收入、老百姓与公务员和企业高管)、强弱关系(健康者与患病者)
价值型 身份关系	身份同构(今天明天身份互换、人民=每个人)、身份异构(自己与别人)
具象型 角色定位	感恩(感谢医生和国家)、观望(未知数)、自我维持(穷人、普通人、小小老百姓)
价值型 角色定位	互助(社会责任、贡献国家、帮助有需要者)、自立 ^① (应得、劳动所得、产权私有)

主轴编码形成7个主类属,选择性编码抽象为4个核心类属,包括话语认同表达、话语信息匹配、话语情境感知、自我观念,类属含义见表7。参照已有理论,话语情境感知和自我观念均分为价值和具象两个维度。结合表6,具象自我表达为感恩、自我维持、观望三种角色定位,以及对代际关系、收入及职业群体间关系、强弱关系等现实人群关系的认知;价值自我表达为互助、自立两种角色定位,以及对参保主体间应然身份关系的认知。

表7 主类属与核心类属

核心类属	主类属	类属	类属含义
话语认同 表达	认同倾向	认同倾向	主体的赞同或不赞同倾向
	信任	制度信任 政治信任	主体对医保制度及国家、政府的预期感、信念和信心
话语信息 匹配	价值判断	问题认知 价值评价	主体对门诊共济改革正当性、合理性的评价
	利益判断	利益评价 措施评价	主体对个账与门诊利益变化的预期,以及自身是否适用的评价
话语情境 感知	情境感知	具象情境	主体已有或当前感知到的具体场景特征,如体验感、压力或风险感等
		价值情境	主体已有或当前接收到的政策话语价值阐释

① “自立”原指依靠劳动挣得社会保险权益的价值假定。它与保险风险共济并不冲突,但常与产权私有、多缴多得相一致,与社会共济和再分配存在张力。资料中,多缴多得的认知甚至否定了保险共济,且未见其与“互助”兼容的表达。

续表			
核心类属	主类属	类属	类属含义
自我观念	具象自我	具象型身份关系	主体描述的具体场景中我(群/代)与他(群/代)的实质身份关系,特别是利益分配关系
		具象型角色定位	主体描述的具体场景中的自我社会位置或自我定位
	价值自我	价值型身份关系	主体对医保制度中我(群/代)与他(群/代)应当是何种关系的认知
		价值型角色定位	主体对自身在医保制度中的应然责任和义务的认知

注:类属含义界定参考了已有文献,包括制度和政治信任(Citrin,1974);利益与价值判断(Dunn,2018);具象情境及身份、角色(Cooley,1902;陈文斌,2016);价值情境及身份、角色(Taylor,1989;威利,2011)。

(二) 类属关系与认同路径分析

表 8 根据资料关联归纳出四种类属关系(“↔”表示相互影响):A. 利益判断↔价值判断;B. 价值自我/具象自我↔价值/利益判断;C. 情境↔自我观念;D. 情境↔信任↔价值/利益判断。这些类属关系同时对应了五种自我角色感知下的认同路径:互助-支持、自立-对抗、感恩-支持、压力-对抗、细则-观望;少数资料呈现了交叉组合。

表 8 类属关系与认同路径

关系类型	关系内涵	典型资料示例	认同路径
A	单独利益判断	[a]老百姓的福利(1D008)	感恩-支持
		[b]扛不住才去医院(1D142);门诊贵多掏钱(2D114)	压力-对抗
	价值判断统合利益判断	[c]医保是保险而非储蓄,健康者交保费不亏(1D029)。少一大笔钱但用在真正需要的地方(1D536)	互助-支持
		[d]养老、医保都该个人账户制(1D687),自己的钱自己花才能精打细算(3D147)	自立对抗
	价值冲突下二者统合	[e]个账取消是社保进步;但余额高是诚实全额缴纳者的优势,洗牌后完全被抹杀了(1D041)	自立-对抗
	利益判断对抗价值判断	[f]2%根本不够,普通人不该被迫慈善(1D102)	压力-对抗

续表

关系类型	关系内涵	典型资料示例	认同路径
B	具象自我独立表达	[g]打工人、小老百姓没钱交国家(2D304);年轻人背房贷,买点药还能继续加班(1D452)	压力-对抗
	价值自我统合具象自我	[h]老人的今天,我们的明天(1D250);虽年轻人/健康人/富人买单,但身份转换相对公平(3D109);医保蛋糕要让弱势群体多切一块(3D067)	互助-支持
		[i]个账是劳动者应得的工资、私有财产(1D259);凭什么充公给别人用、劫富济贫(1D265)	自立-对抗
	两种自我相互强化	[j]诚然社保人群扩大、钱不够用了,但许多人把个账当救命钱,医保不像养老可以多缴多得,不公平(2D631)	压力/自立-对抗
	具象自我对抗价值自我	[k]个账缩水若是没办法且能照顾弱势群体也罢了,但公费医疗特权病房,我们不给它付费(1D164)	压力-对抗
C	价值情境与自我观念互构	[l]“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医保像蓄水池,分摊风险是永恒主题(1D536)	互助-支持
		[m]之前多缴多得的宣传让你产生错觉(1DAR1-1673);大锅饭时代的倒退(3D126)	自立-对抗
	具象情境与自我观念互构	[n]罕见病、癌症都纳入医保了,需要更多统筹资金,自己的钱被统筹也是社会责任(3D67)	感恩/互助-支持
		[o]小小穷光蛋还被统筹给高官疗养(1D138);最惨80后(2D108);年轻人贴补老人,生育率愁人(1D506)	压力-对抗
D	具象情境与信任互构	[p]感恩主刀医生/政府/医保(1D719);医保那么多人要养,疫情看病/疫苗都免费(1D537)	感恩-支持
		[q]政策变来变去,老百姓越来越焦虑了(1D038、1D089);开始担心我之后的养老金了(1D348)	压力-对抗
	情境不确定	[r]门诊报销病种和范围到什么程度,拭目以待(1D043)	细则-观望

注:A[a]代表关系类型A资料[a]。1D008代表第1组检索词第008条个人博文;1DAR1-1673代表第1组检索词一级评论第1673条。

1. 利益与价值双重动机的多样性、复杂性

与医保研究类似,资料中利益判断表达最为频繁,但也呈现出价值判断与利益判断的复杂性:代表公共利益(门诊统筹)的公共价值(互助共济)与个人利益(门诊/个账)及个人价值(互助共济/自立)存在多种匹配方式。(1)利益判断单独表达,如资料 A[a]、A[b]。正向资料认为利益将提升,呈感恩-支持;负向资料认为利益将受损,呈压力-对抗。(2)主体内部的价值判断统合利益判断,但与外部公共价值呈一致或不一致。正向为互助-支持,如资料 A[c]因认可互助共济而认可个账利益减少。负向为自立-对抗,如 A[d]基于个人产权观念而作出负向利益判断。(3)主体内部价值冲突。如 A[e]既认可互助共济又坚持自立价值,权衡后呈现为自立-对抗。(4)公共价值受个人利益抵制,但未表达个人价值,如 A[f]认可慈善但认为自身不适用,呈压力-对抗。

2. 利益与价值多样性又与自我观念差异化紧密相关

已有研究强调自我观念的价值规范作用(彭国胜, 2012)。而资料呈现了价值自我与具象自我的相互作用。(1)具象自我独立支持利益判断。如资料 B[g]呈现了“打工人”“年轻人”等具象身份认知下的压力-对抗。(2)价值自我统合具象自我。此时表达逻辑更加完整一致、认同倾向更确信。如资料 B[h]身份互换的价值型关系认知,统合了缴费者与受益者的具象身份认知;资料 B[i]“应得”观念下的身份分立,支撑着其具象利益剥夺感。(3)具象自我的利益冲突抵制互助型价值自我,如资料 B[k]。(4)具象自我与价值自我相互强化,如资料 B[j]呈压力/自立双重对抗。

3. 情境与自我观念的互构

已有研究关注自我观念的情境敏感性(Hogg and Abrams, 1998),而资料呈现了价值与具象两种情境的作用,且负向评价对具象压力、风险因素更敏感。(1)价值自我与价值情境互构。资料 C[I]和 C[m]几乎再现了中国卫生政策的钟摆式变迁(翟文康和张圣捷, 2021),即从“大锅饭”到市场化再到公益性回归。对个账产权的误解也与 1998 年医保政策表述相关^①。(2)具象自我内嵌于更广泛的具象情境中,表 6 涵盖个体、社会、制度及舆论等多方面。资料 C[o]呈风险叠加式的压力-对抗。(3)具象情境与价值自我互构。如资料 C[n],正向制度经验强化了主体的“社会责任”感,呈感恩/互助双重强化。

4. 具象情境与信任的互构

如资料 D[P]和 D[q],以往的情境记忆构成信任基础,认同路径分别呈感恩-支持和压力-对抗。此外,具象情境的不确定性直接影响利益判断,如资料 D[r],且该情况在缺乏医保知识的群体中更明显。

本研究对类属关系进一步提炼,形成两种主要的认同逻辑:价值自我主导和具

^① 根据 1998 年《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个人账户的本金和利息归个人所有,可以结转使用和继承”。但这里仅指个账内已有资金,并未排除个账存入比例调整的合理性。文件原文使用“帐户”,今规范用法为“账户”。

象自我主导(见表9),哪个占主导取决于价值自我的明晰性、具象自我的敏感性、二者倾向一致性。[1]~[5]归纳了两种自我逻辑相互作用的五种方式,对应不同的认同路径,呈多样化心理图景。[1]和[2]为价值自我统合具象自我;互助-支持路径持身份同构关系认知,正向体谅情境要素,支持互助共济;自立-对抗路径持身份分立、冲突异构的关系认知,负向理解情境要素,反对互助共济。[3]和[4]为具象自我主导,或独立呈现,或对价值自我形成抵制。[5]为两种逻辑相互支持、彼此强化。

表9 价值自我与具象自我的相互作用方式

主导逻辑	作用方式	认同路径
价值自我主导	价值自我统合具象自我[1]	互助-支持(A[e]、B[h]);自立-对抗(A[d]、B[i])
	价值自我冲突下统合具象自我[2]	自立-对抗(A[e])
具象自我主导	具象自我独立表达[3]	感恩-支持(A[a]、D[p]);细则-观望(D[r]);压力-对抗(A[b]、B[g]、C[o]、D[q])
	具象自我对抗价值自我[4]	压力-对抗(A[f]、B[k])
共同主导	两种自我相互强化[5]	感恩/互助-支持(C[n]);压力/自立-对抗(B[j])

注:[1]~[5]为不同作用方式。A[a]~D[r]对应表8中资料编号。

根据表8的类属关系,图4将主体认同心理过程描述为“话语-情境-自我”循环互构理论框架,包含以下作用机制。(1)自我观念是主体利益与价值认同的核心阐释逻辑。它搭建起主体的权利、义务价值标准与现实利益判定原则,呈现了自我图示及类型化特征。而利益与价值判断也在不断塑造着自我观念。因而图4中,自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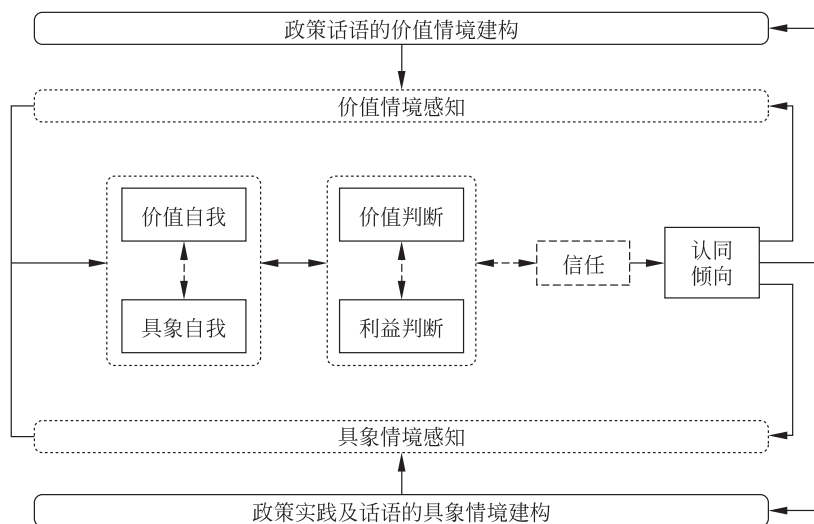


图4 “话语-情境-自我”循环互构

观念与价值、利益判断呈双向联结,有时在表达上互为一体。(2)价值自我与具象自我之间、价值判断与利益判断之间也呈双向关系,并呈现多样化的组合样态。(3)自我观念既源于情境又建构情境。自我概念植根于社会生活,不同阅历、记忆形塑差异化的自我认知(俞国良等, 2016);而情境本身亦经由主体自我阐释而生成,资料所见也仅为主体在主观上可获得的自我描述的一部分(Hogg and Abrams, 1998)。因而图 4 将自我观念、信息匹配与认同表达整体嵌入价值情境和具象情境之中,形成自我与情境的互构。此外,情境亦可能直接与信任形成互构,并与信息判断相互影响。(4)“话语-情境-自我”的循环互构。一方面,情境以话语为媒介建构自我观念,如政策价值言说、社会经验的舆论传播;另一方面,主体自我描述和认同表达也构成了话语实践(Fairclough, 1989),通过意见反馈和社会舆论融入情境,也是一种情境建构力量。

六、结论

在涉及复杂利益冲突与高价值张力的政策领域,理解公众心理两种动机的相互作用及主体间差异化心理图景,有助于提升政策话语言说效果、增进深层认同。本文依托医保门诊共济改革真实政策场景,结合量化分析与扎根理论方法,较为完整地呈现了政策话语的认知断裂—话语调整—认同变化的动态演进过程。研究发现:政策话语策略改变后,总体认同倾向虽有所改善,但并未在共济/个账话语类型之间呈系统性差异;这种复杂性在个体层面表现为认同路径的多样化,源于主体的利益判断与价值判断、具象自我与价值自我的多样组合;这些差异化的心理图景形成于“话语-情境-自我”循环互构的过程,包含自我与情境的双向建构。

上述发现回应了既有理论争议。(1)回应了利益与价值动机的复杂性(郭跃等, 2023),及其“分立”与“统合”的关系争论(Boudon, 2003; Schmidt, 2010)。本文发现了多种组合样态:特定话语言说下,主体政策认同并非简单的价值或利益的信息匹配,而是以自我观念为核心的自我阐释,呈现价值与具象双重自我主导下的差异化路径;二者有多种相互作用方式,哪种方式占主导取决于价值自我的明晰性、具象自我的情境敏感性及二者方向的一致性;既存在价值自我对具象自我的有条件统合作用,也存在具象自我对价值自我的反向作用。(2)补充了对自我观念的情境性的理解。已有研究或强调情境敏感性、流动性,或侧重客观“硬性”身份分类及稳定性(Brubaker and Cooper, 2000; Baron and Branscombe, 2012)。本文发现,自我观念既非完全“硬性”也非完全“流动”,而是兼具长期政策话语及实践建构下的稳定性,以及改革政策言说下的部分可塑性,但其可塑性仍受限于主体既有的心理基础。政策言说重点的转变,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总体舆论环境及主体的部分认知,但要沉淀为稳定的认同心理仍需长期建构,且取决于主体的主观自我选择。

基于上述讨论,笔者有如下研究思考。

第一,理解主体利益与价值表达背后的自我观念系统,是解构差异化认同心理的有益途径。研究者不仅能了解主体“如何”理解,更能了解其“为何”如此理解。这有助于进一步揭示真实政策场景中“人”的差异化主观世界和行为逻辑,为政策设计和话语语言说提供更完整的主体知识,提升其精准性。

第二,理解主体自我观念的多重性与情境性之间的相互约束,有助于进一步揭示政策话语建构效果的复杂性、条件性及其限度。一方面,主体拥有“多重自我”,“私利”只是“特定情形”下某一种自我主导的体现(李普曼,2018)。政策话语建构作用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塑造或改变情境,唤醒主体中与政策目标相一致的“隐蔽”自我,并在政策设计和话语语言说中包容“差异化”的自我。另一方面,政策话语的作用又是有限度的。情境是由主体自我选择和阐释的(Hogg and Abrams, 1998),主体自我观念的表达本身也具有情境建构性(Fairclough, 1989)。

第三,面向公共政策话语实践,特别在高冲突性的政策领域,需重视主体的价值自我对具象自我的统合作用。一是强化与政策价值目标相匹配的主体间身份关系建构,并细化政策措施以明确利益预期,打通价值自我与具象自我的内在联结。二是重视并警惕部分主体对具象风险、压力情境的高度敏感性,建立常态化认同反馈机制和政策解读渠道,增强改革回应性与认知缓冲。

此外,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门诊共济改革相比一般的政策调整具有更高的利益与价值冲突性,其他场景中结论的普适性仍有待检验。微博用户的年轻化特征可能放大了代际冲突和利益冲突话语表征;但也提示了对年轻群体共识建构的必要性。微博数据本身也具有非结构性、样本间非独立性及一定程度的偶然性等特征,其用户信息的可控混淆因素也相对有限,因而量化结论仍需进一步开展因果分析。

参考文献

- 包国宪,刘宁. 2019. 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建设中的公民参与研究——以新农合为例[J].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6): 58-67, 126.
- Bao G X, Liu N. 2019. Citizen participation on reform of health insurance schemes in rural China: Evidence from the New Cooperative Medical Scheme[J]. *Journal of Gansu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6): 58-67, 126. (in Chinese)
- 陈潭. 2006. 政策动员、政策认同与信任政治——以中国人事档案制度的推行为考察对象[J]. 南京社会科学, (5): 65-71.
- Chen T. 2006. Policy mobilization, policy identification and trust politics: A case study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personnel file system in China[J]. *Social Sciences in Nanjing*, (5): 65-71. (in Chinese)
- 陈文斌. 2016. 主体,自我,身份——关于符号自我的考察[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9(1): 89-94.
- Chen W B. 2016. Subject, self, and identity: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sign of self[J]. *Journal of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49(1): 89-94. (in Chinese)

- 郭跃, 邓仪正, 付雪聪. 2023. “宏大叙事”与“切身利益”: 政策接受度的多层次比较分析[J]. 公共行政评论, 16(5): 67-85, 197.
- Guo Y, Deng Y Z, Fu X C. 2023. “Grand narrative” and “personal interest”: A multi-level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olicy acceptance [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16(5): 67-85, 197. (in Chinese)
- 景怀斌. 2021. 行为公共政策研究的知识构建: 三个层面及范式选择[J]. 中国行政管理, (9): 56-63.
- Jing H B. 2021.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of behavioral public policy: Three perspectives and its paradigm[J].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9): 56-63. (in Chinese)
- 李佳. 2018. 基于福利认同视角的“新农合”满意度评价研究[J]. 东北财经大学学报, (3): 62-68.
- Li J. 2018. An evaluation on satisfaction rate of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System” based on welfare identification [J]. *Journal of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3): 62-68. (in Chinese)
- 李普曼 W. 2018. 舆论[M]. 常江, 肖寒,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37.
- Lippmann W. 2018. Public opinion [M]. Chang J, Xiao H, tran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37. (trans. into Chinese)
- 李蓉蓉, 李晓丹, 段萌琦. 2023.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政治态度的变化路径研究——基于扎根理论的分析[J]. 公共管理评论, 5(2): 95-116.
- Li R R, Li X D, Duan M Q. 2023. Research on the changing paths of political attitudes in major public health incidents: An analysis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J]. *China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5(2): 95-116. (in Chinese)
- 李燕. 2020. 公民政策遵从: 理论基础、形成机制与干预策略[J]. 探索, (3): 156-169.
- Li Y. 2020. Citizen policy compliance: Theoretical basis, mechanisms and intervention strategy[J]. *Probe*, (3): 156-169. (in Chinese)
- 鹿斌. 2023. 乡村振兴中政策营销何以有效: 基于框架效应的调查实验研究[J]. 公共行政评论, 16(5): 46-66, 197.
- Lu B. 2023. Promo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policy marketing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 analysis of survey experiments based on the framing effect [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16(5): 46-66, 197. (in Chinese)
- 彭国胜. 2012. 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社会福利价值认同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贵州省为例[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2(2): 1-7.
- Peng G S. 2012. On the rural residents' identity of social welfare value and its influence factors in underdeveloped areas: A case study of Guizhou Province [J]. *Journal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12(2): 1-7. (in Chinese)
- 仇雨临, 张静祎, 徐璨, 等. 2009.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满意度研究: 以天台县为例[J]. 中国卫生政策研究, 2(2): 11-17.

- Qiu Y L, Zhang J Y, Xu C, et al. 2009. Research of satisfactory degree on urban residents health insurance: Tiantai county as an example[J]. *Chinese Journal of Health Policy*, 2(2): 11-17. (in Chinese)
- 桑玉成. 2006. 政策预期与政策认同及其对于社会公正的意义[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46(4): 32-37.
- Sang Y C. 2006. Policy expectation, policy recognition and their significance to social justice[J]. *Jilin University Journal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46(4): 32-37. (in Chinese)
- 王超群, 李珍. 2019. 中国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的制度性缺陷与改革路径[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 27-37, 164.
- Wang C Q, Li Z. 2019. Institutional defects and reform path of individual account of China's basic medical insurance[J]. *Journal of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 27-37, 164. (in Chinese)
- 王国红. 2007. 试论政策执行中的政策认同[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36(4): 46-49.
- Wang G H. 2007. On policy identity in policy implementation[J].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36(4): 46-49. (in Chinese)
- 威利 N. 2011. 符号自我[M]. 文一茗, 译.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 1, 16-17, 38-42.
- Wiley N. 2011. Semiotic self[M]. Wen Y M, trans. Chengdu: Sichuan Education Press: 1, 16-17, 38-42. (trans. into Chinese)
- 邢千里, 刘列, 刘奕群, 等. 2015. 微博中用户标签的研究[J]. *软件学报*, 26(7): 1626-1637.
- Xing Q L, Liu L, Liu Y Q, et al. 2015. Study on user tags in Weibo[J]. *Journal of Software*, 26(7): 1626-1637. (in Chinese)
- 杨燕绥, 李超凡, 于森, 等. 2020. 医保筹资与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权益置换改革[J]. *中国医疗保险*, (8): 10-16.
- Yang Y S, Li C F, Yu M, et al. 2020. Equity replacement reform of medical insurance financing and worker medical insurance personal account[J]. *China Health Insurance*, (8): 10-16. (in Chinese)
- 杨正联. 2010. 公共政策语境中的话语与言说[M].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7-43, 54.
- Yang Z L. 2010. Words and discourse in public policy context[M]. Beijing: Guangming Daily Publishing House: 27-43, 54. (in Chinese)
- 于长永. 2012. 农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福利认同及其影响因素[J]. *中国农村经济*, (4): 76-86.
- Yu C Y. 2012. Farmers' welfare identification with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J]. *Chinese Rural Economy*, (4): 76-86. (in Chinese)
- 俞国良, 等. 2016. 社会心理学前沿[M]. 3版.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60, 177.
- Yu G L, et al. 2016.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M]. 3rd ed. Beijing: Beijing

-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160, 177. (trans. into Chinese)
- 袁方成, 李会会. 2020. “同意的治理”: 理解政策认同的实践逻辑——Y 县宅基地改革观察[J]. 探索, (3): 142-155.
- Yuan F C, Li H H. 2020. “Governance Based on Consent”: Understanding the practical logic of policy identification—Y county homestead reform observation[J]. *Probe*, (3): 142-155. (in Chinese)
- 郑秉文. 2023. 防止医保个人账户返款的产权属性被误读[J].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4): 63-67.
- Zheng B W. 2023. Avoiding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entitlements of individual account in health insurance[J]. *Chinese Cadres Tribune*, (4): 63-67. (in Chinese)
- 郑建君. 2015. 政治沟通在政治认同与国家稳定关系中的作用——基于 6159 名中国被试的中介效应分析[J]. 政治学研究, (1): 86-103.
- Zheng J J. 2015. Role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identity and national stability: A mediation effect based on 6159 participants[J]. *CASS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 86-103. (in Chinese)
- 翟文康, 张圣捷. 2021. 政策反馈理论视域: 中国医疗卫生政策钟摆式变迁及其逻辑[J]. 中国卫生政策研究, 14(9): 1-7.
- Zhai W K, Zhang S J. 2021.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feedback theory: The pendulum change of China's health policy and its logic analysis[J]. *Chinese Journal of Health Policy*, 14(9): 1-7. (in Chinese)
- 周忠良, 曹丹, 刘观平, 等. 2023. 公共危机事件中政策认同的构建研究——基于陕西省的实证分析[J]. 公共行政评论, 16(5): 125-140.
- Zhou Z L, Cao D, Liu G P, et al. 2023. Constructing policy identity during a public crisis event: Empirical analysis of Shaanxi Province's experience[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16(5): 125-140. (in Chinese)
- Ariely D. 2008. Predictably irrational: The hidden forces that shape our decisions[M]. London: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 Atkinson P A, Coffey A J, Delamont S. 2003. Key theme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Continuities and changes[M]. New York: Rowan and Littlefield: 149.
- Baron R A, Branscombe N R. 2012. Social psychology[M]. 13th ed. New Jersey: Pearson Education: 115-120.
- Bigley G A, Pearce J L. 1998. Straining for shared meaning in organization science: Problems of trust and distrust[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3(3): 405-421.
- Blyth M. 2002. Great transformations: Economic idea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oudon R. 2003. Beyond rational choice theory[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9(1): 1-21.

- Bowles S. 2016. The moral economy: Why good incentives are no substitute for good citizens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45.
- Brubaker R, Cooper F. 2000. Beyond “Identity” [J]. *Theory and Society*, 29(1): 1-47.
- Citrin J. 1974. Comment: The political relevance of trust in government [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8(3): 973-988.
- Cooley C H. 1902. Human nature and the social order [M].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68-210.
- De Groot J I M, Steg L, Poortinga W. 2013. Values, perceived risks and benefits, and acceptability of nuclear energy [J]. *Risk Analysis*, 33(2): 307-317.
- Druckman J N. 2001. The implications of framing effects for citizen competence [J]. *Political Behavior*, 23(3): 225-256.
- Dunn W N. 2018. Public policy analysi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M]. 6th ed.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321-324, 328, 355-356.
- Fairclough I, Fairclough N. 2012. Pol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 method for advanced students [M]. London: Routledge: 106-109.
- Fairclough N. 1989. Language and power [M]. London: Longman.
- Funk C L. 2000. The dual influence of self-interest and societal interest in public opinion [J].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53(1): 37-62.
- Hogg M A, Abrams D. 1998. Social identifications: A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and group processes [M]. London: Routledge: 22.
- Kangas O E. 1997. Self-interest and the common good: The impact of norms, selfishness and context in social policy opinions [J]. *The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26(5): 475-494.
- Kennedy B L, Thornberg R. 2018. Deduction, induction, and abduction [M]//Flick U. The SAG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Data Collec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49-64.
- Lasswell H D. 1970. The emerging conception of the policy sciences [J]. *Policy Sciences*, 1(1): 3-14.
- Schmidt V A. 2010. Taking ideas and discourse seriously: Explaining change through 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 as the fourth ‘new institutionalism’ [J]. *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1): 1-25.
- Schwartz S H. 1977. Normative influences on altruism [M]//Berkowitz L.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0: 221-279.
- Steg L, Dreijerink L, Abrahamse W. 2005.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acceptability of energy policies: A test of VBN theory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5(4): 415-425.
- Taylor C. 1989. 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olicy Discourse and Policy Identification: Interests, Values, and Self-concepts in China's Outpatient Mutual-aid Health Insurance Reform

QIU Yuhui^{1,2}

(1.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chool of National Security,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 Center for Political Security and Governance Training,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bstract: The impact of policy discourse on shaping policy identification depends on the extent to which diverse individual interests and values align with the policy information. However,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may be more complex. This study offers a real policy context, the Outpatient Mutual-aid Reform of Public Health Insurance (OM Reform). Its contributions are twofold: (1) it investigates the full interactive process between policy and the public by employing bot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es of Sina Weibo data; and (2) it examines individuals' diverse self-concepts, interests, and values, as well as the complex effects of policy discourse on policy identification.

The findings address existing theoretical disputes. (1) Previous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wo motivations—abstract values and concrete interests—often lead to conflicting understandings of policy information. Using a grounded theory method, this paper finds that individuals' notions of self—both the value self and the concrete self—play a key role; their varied configurations determine five different identification approaches, contingent on the clarity of the value self and the sensitivity of the concrete self. (2) Previous findings have shown that people's notions of self and their motivations may be either stable or fluid in response to shifts in policy discourse. Using quantitative analysi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olicy identifica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changed its policy discourse strategies. However, the attitudin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strategies a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when assessed independently before and after policy discourse shift. This means that while public opinion may respond to changes in discourse, the notions of self, the self-interpretation of values and interests, are more stable. (3) Qualitative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is complexity is derived largely from the disparity between current policy interpretations and memories of earlier policy discourses and practices as well as from the individuals' already shaped self-concepts, which have been formed consistently through the cyclical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discourse-context-self”.

This paper also provides an example of policy identification research from a self-

concept-based perspective. It reveals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individuals' diverse self-interpret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policy identification, and sheds light not only on how interests and values are perceived but also on why they are perceived in particular ways. This helps to form a complete picture of how real people react to policy discourse strategies.

Nevertheless, this research has several limitations. The OM Reform involves complex interests and value conflicts, thus requiring validation in other policy domains. The Weibo data are mainly derived from younger users, which may result in an amplification of the conflicting attitudes. Nevertheless, the data still provide meaningful insights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cy identification among the younger generations. Due to the limitations of unstructured data, the quantitative findings require further testing to establish causal relationships.

Keywords: Outpatient Mutual-aid Reform ; policy discourse; policy identification; self-concept; grounded theory

投稿日期: 2024/9/4 送外审日期: 2024/9/11 首轮外审完成日期: 2024/10/21
录用日期: 2025/3/14 最终修回日期: 2025/6/27